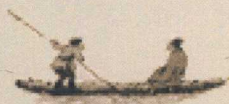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》

总第三十七辑

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

雷思沛

诗辑注

主 编：蔡建国

副主编：周德富

秦兴友

辑 注：周德富

长江出版传媒
湖北人民出版社

《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》
总第三十七辑

宜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雷思沛

诗辑注

主 编：蔡建国
副主编：周德富 秦兴友
辑 注：周德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思需诗辑注 / 周德富 辑注. — 武汉: 湖北人民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216-08330-0

I. 雷… II. 周… III. 古典诗歌—注释—中国—明代

IV. ①I222.7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1487号

出 品 人: 袁定坤

责任部门: 时政经济与鄂西分社

责任编辑: 余兆伟

封面设计: 早晨文化

责任校对: 范承勇

责任印制: 王 超

法律顾问: 王在刚

出版发行:湖北人民出版社

印刷:武汉市籍缘印刷厂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版次:2014年9月第1版

字数:300千字

书号:ISBN 978-7-216-08330-0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

邮编:430070

印张:21.875

印次: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55.00元

本社网址: 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本社旗舰店: <http://hbrmcbs.tmall.com>.

读者服务部电话: 027-87679656

投诉举报电话: 027-876797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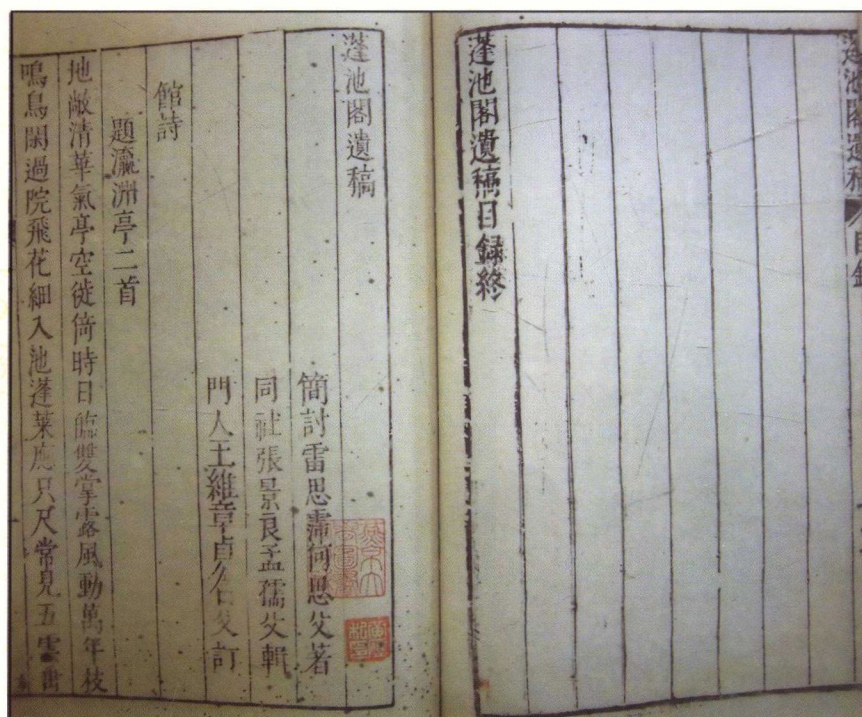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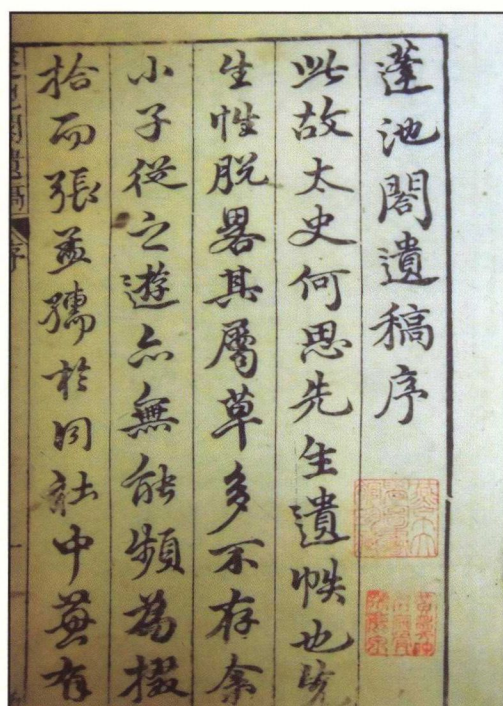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)



雷思霈的残碑砚（来自《清远日报》）



雷思霈的书法《双寺碑》
拓片（现藏国图）



《蓬池閣遺稿》（現藏北大圖書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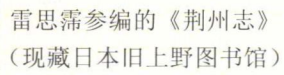
者一集有之一篇有之一句有
之雖已之筆與腕不能留之使
不往而隔之使不相通者是柯
物也非詩文也而其人也
萬曆丁巳秋門人鍾惺拜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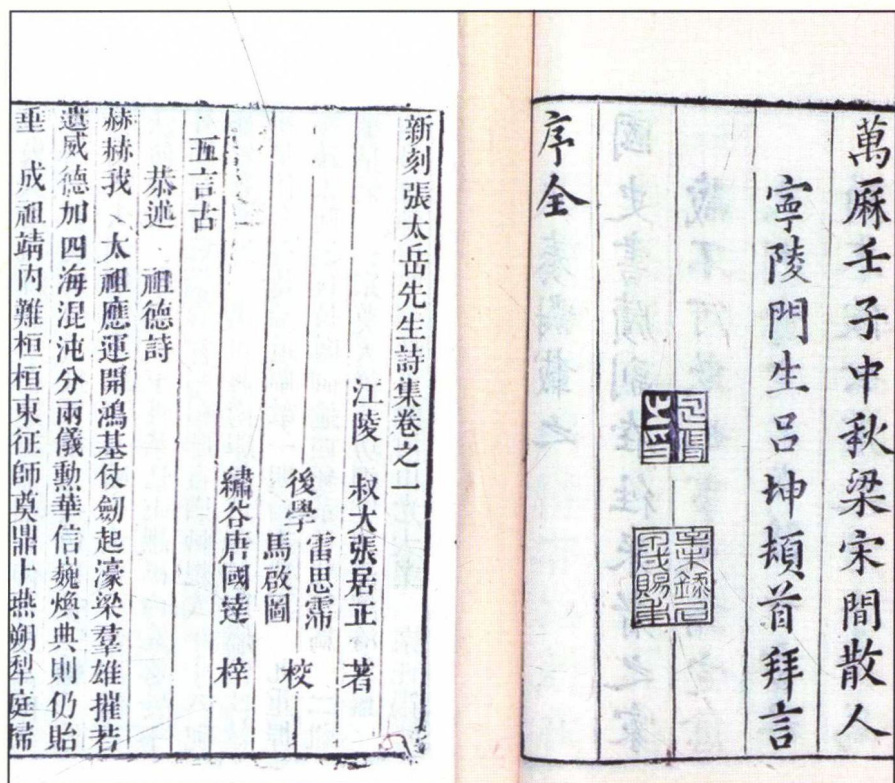
先師雷何思太史集序
先生有先生之人不得以詩人
文人待之選其詩文不待不以
詩人文人待之也先生沒惺於
先生詩文逸于集外者心誠求
之不遺餘力乃集中所存反有

《雷检讨诗集》（现藏日本内阁文库）

雷太史詩序
何思与余同臭味而各有所嗜何
思嗜似余嗜佛而若者若余途
而不相关然皆有诗癖余癖而
拙何思癖而工夫同道人玉璧子
恐不免而况於求不然何思過
矣
公晏友弟袁宏道識
雷檢討詩
夷陵雷思齊何思甫著
太和山
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羣峰護其下泉壑流
其泉鄢襄青其野江漢合其纏紫官居其施金
觀絕其顛其陽產若木其陰種芝田塵世應寄
頂欲界兜率天五嶽真形假三山有擔過吾欲
挾之走須彌芥子懸
天柱峰

《雷检讨诗集》（现藏日本内阁文库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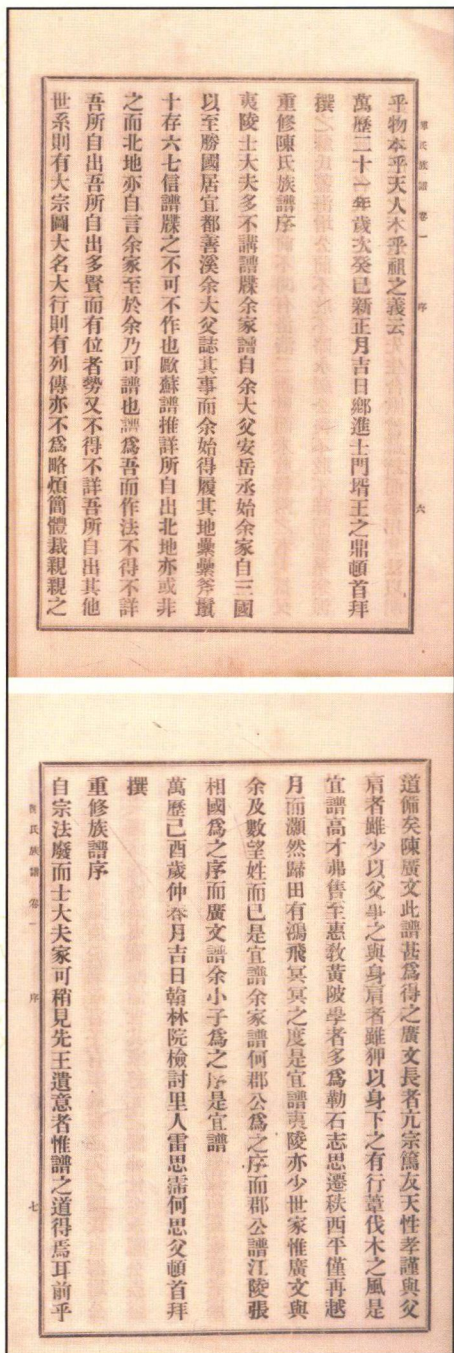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雷思需参与刊刻的《张太岳先生诗集》（明万历40年刻本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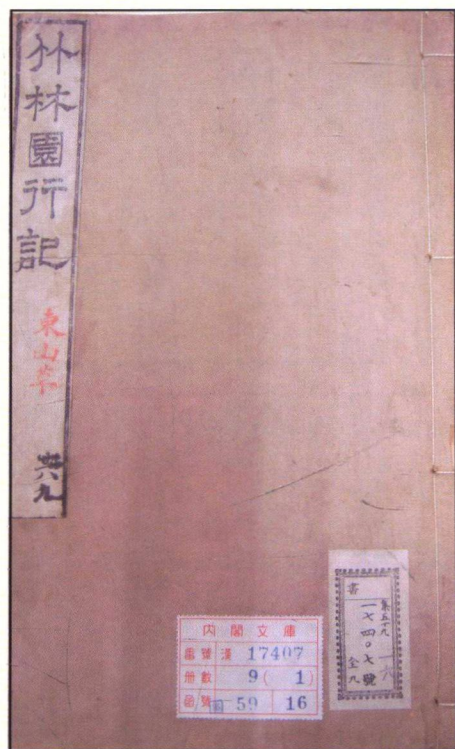


雷思需作序的《翼乘》（顺治年间刻本）



雷思需作序的《陈氏族谱》
(欧阳运森提供)

雷思需作序的《陈氏族谱》
(欧阳运森提供)



雷思需的好友刘戡之的诗集
(今藏日本内阁文库)



雷思霈的忘年交王篆的石像（胡祖义摄）



1909年的东山寺览胜楼（修建于明万历年间）



1908年的宜昌码头



1908年俯瞰宜昌城，较大的湖泊为南湖

《雷思霈诗辑注》编委会名单

编委会主任：李亚隆

编委会副主任：伍卫星 李盈奕 黄克 李德才

蔡建国 屈鹏 黄惠宁 望蓉

编委会成员：尚葵 李志新 赵爱萍 覃根深

孟美蓉 彭定新 周明祖 潘德远

杨黎明 杨慕楠 曹文金 秦兴友

陈刚

主 编：蔡建国

副主 编：周德富 秦兴友

辑 注：周德富

编 务：揭明

序

陈文新

说起公安派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“公安三袁”，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，三兄弟所留下的那些光照千古的华章是世代公安人的骄傲；但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并非公安人的公安派作家，比如桃源（今属湖南）江盈科、会稽（今属浙江）陶望龄、夷陵（今属湖北宜昌）雷思霈等。他们和“公安三袁”一起，共同开创了晚明文学的新局面，共同书写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。

—

明代文化人，对社会空间的选择大抵有三个取向：台阁、郎署和山林，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风。从永乐到弘治年间，这是台阁体的黄金时代，台阁要员如三杨、李东阳等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文坛；正德、嘉靖两朝，郎署文风居于主导地位，前七子的地位凌驾于茶陵派之上，后七子的声势更远远盖过了严嵩；万历以降，不仅山林隐逸的创作弥漫着山林气，即使是那些身居台阁和郎署的人，也往往高谈“性灵”，公安派是这一时期文坛最杰出的代表。

台阁与郎署在明代的政府布局中地位不同，职能也不同。台阁要员身为国家重臣，他们在公众视野中代表的是国家形象，在事实上要完成皇帝委托的各类事务，要协调各类官员之间的关系，相应地，他们也就需要具备与其身份一致的涵养。俗话说，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，一种宽和雍容的气象，即使是表面的宽和

雍容，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。无论背后有多少心机和算计，喜怒不形于色都是台阁要员必备的素质，不加节制地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和对朝政得失的褒贬是不得体的，也是不明智的。与台阁要员的职能不同，郎署官员一方面是六部旨意的执行者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台阁甚至是皇帝的批评者。作为台阁和皇帝的批评者，他们代表的是社会舆论，显示的是传统读书人为民请命的品格。既然是为民请命，就要有锋芒，有担当，不怕打击，不怕挫折。在明代，我们不止一次见到这样的郎署官员，例如杨继盛，例如海瑞，前七子盟主李梦阳、后七子盟主李攀龙也属于这类人物。而且，为了政治生态的平衡或改善，郎署官员在国家大事上仗义执言和批评台阁要员，不仅在官样文章中是受到鼓励的，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也受到鼓励。例如，《明史·陆昆传》载陆昆上疏武宗陈重风纪八事，其一即为：“奖直言。古者，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宋制，御史入台，逾十旬无言，有辱台之罚。今郎署建言，如李梦阳、杨子器辈，当加旌擢，而言官考绩，宜以章疏多寡及当否为殿最。”可见自宋代以来，郎署官员即有上疏直言之责。这种职务上的要求也使他们常常同台阁要员发生矛盾。

台阁与郎署两类官员的职能差异往往导致文风的差异，台阁文风通常雍容华贵，以点缀升平为能事，郎署文风则通常雄健有力，敢于面对社会问题。陈懿典《皇明馆阁文抄序》指出：文章之变不可胜穷，才人之致无所不有，故文章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。但是，对馆阁文，仍有其特殊要求，即不能“不典”，不能“失裁”，“在馆阁则才不可逞，体不可越”。陈懿典强调，“馆阁文”的这种特殊风格，与“述典诰铭鼎彝”的特殊职能有关。王锡爵《袁文荣公文集序》也说：“锡爵间颇闻世儒之论，欲以轧茁骖骹、微文怒骂，闯然入班扬阮谢之室。故高者至不可句，而下乃如虫飞蜂鸣，方哢哢鸣世，以谓文字至有台阁体而始衰。尝试令之述典诰铭鼎彝，则如野夫闺妇强衣冠揖让，五色无主，盖学士家溺其职久矣。”所谓“世儒”，指的是供职郎署、以中层官员为主体的七子派；所谓“述典诰铭鼎彝”，指馆阁文臣经常采用的几种用于朝政的特殊文体，而这些特殊文体是郎署官员所不熟悉或不必擅长的。王锡爵用文体的特殊性为馆阁文的“和平典重”辩护，其理由是成立的。但需要指出一点，馆阁作家在“述典诰铭鼎彝”之外，也热心于这种“和平典重”的风格，这就不能用文体的特殊性来加以辩护了，而只能视为一种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殊趣味。陈懿典和王锡爵所描述的，实即台阁文的流派风格。而七子派的文章，则经常指斥时弊，锋芒毕露。

公安派提倡“性灵”，偏爱“趣”、“韵”。对“性灵”或“趣”、“韵”的强调，表达了对某种摆脱身份意识的生活方式的向往。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

西通常是在热情洋溢的状态下创造出来的，一味地注重身份只会造成思想和感情的沉闷。如果表达得周全些，不妨这样说：没有热情洋溢的成分，生活是有趣味的；一味地热情洋溢，生活则是危险的。深谋远虑与热情洋溢是我们人类面对的两种难以统一的选择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人们宁愿选择深谋远虑，因为危险与趣味相比，对危险的恐惧毕竟容易压倒对趣味的热衷。然而，“性灵说”和趣韵说，强调的正是趣味，而忽视未来的危险。袁宏道甚至把因热情洋溢而招致的危险也视为一种趣味，他在给舅父龚惟长的信（《与龚惟长》）中，意气不凡地提及“人生五乐”：“真乐有五，不可不知。目极世间之色，耳极世间之声，身极世间之安，口极世间之谭，一快活也。堂前列鼎，堂后度曲，宾客满席，觥罍若飞，烛气熏天，巾簪委地，皓魄入帷，花影流衣，二快活也。篋中藏万卷书，书皆珍异。宅畔置一馆，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，就中择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、罗贯中、关汉卿者为主，分曹部署，各成一书，远文唐、宋酸儒之陋，近完一代未竟之篇，三快活也。千金买一舟，舟中置鼓吹一部，知己数人，游闲数人，泛家浮宅，不知老之将至，四快活也。然人生受用至此，不及十年，家资田地荡尽矣。然后一身狼狈，朝不谋夕，托钵歌妓之院，分餐孤老之盘，往来乡亲，恬不为怪，五快活也。士有此一者，生可无愧，死可不朽矣。若只幽闲无事，挨排度日，此世间最不紧要人，不可为训。”人之所以为人，一个基本的标志是他遵循理性生活。为了未来的快乐而忍受眼前的痛苦，这是合乎理性的；为了眼前的快乐而造成未来的痛苦，这是不合理性的。袁宏道提及第五乐，说明他并非不能深谋远虑，而是故意表明不愿深谋远虑。他如此豪迈地拒绝深谋远虑，当然是因为身份的压抑令他厌倦，当然是因为身份意识已经使许多人变得萎缩而虚伪。

换一个角度考察公安派的性灵说或趣韵说，我们发现，其特征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了功利的标准。他们喜欢不寻常的东西、罕见的东西，乐于从渺远和新奇的境界中寻求美感。摆脱台阁身段和郎署身份的约束是创造新奇的有效方式。他们倡导摆脱身份意识，他们倡导一种神采飞扬、不计后果的情感方式，他们调侃流行的行为标准和审美标准。他们的那类议论，也和其情感方式一样，飘逸不拘，不循常轨。

二

同为楚人的雷思霈，也和公安三袁一样，是个在艺术的世界里不循常轨的人。钱谦益曾在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批评雷思霈与公安派路数相同，“信心放笔”，“而不知约之以礼”，雷思霈的门生、竟陵派盟主钟惺则在《先师雷何思

太守集序》中以崇敬的笔调特别引用了雷思霈本人的话：“不泥古学，不蹈前良，自然之性，一往奔诣。”钱谦益从反面说，钟惺从正面说，褒贬不同，但讲的都是雷思霈在诗文领域敢于打破“格套”的特点。

雷思霈去世后，钟惺写了《告雷何思先生文》。在这篇祭文中，钟惺着力突出了雷思霈的忧国之心。“察先生平日神意议论，似恒服膺赵学士大洲者。呜呼，时事至今日，非用大洲时哉！”“今年二月居燕，某病矣，病而垂绝，自谓不复见先生矣。以老亲后事属密友，国家后事属先生。为书一纸遗先生，略曰：私情说不得，言国事即私情也。”这样一个时时忧虑国事的雷思霈，岂不是和“公安三袁”面目迥异么？

其实不然。“公安三袁”不愿在诗文中说格调很高的话，是因为这类话经常被人用来装点门面，即所谓“自从老杜得诗名，忧君爱国成儿戏”。（袁宏道《显灵宫集诸公，以“城市山林”为韵》）三袁在内心里倒是信奉儒家理念的，他们是一群很有责任感的士大夫。以袁宏道为例，他确乎是一介名士，作小品文，赞《金瓶梅》，具见其名士派头。然而，他身上的儒家士大夫气质，在一定的场合，在一定的的人生阶段，便会表现为具体的言行。比如，宏道主陕西乡试，所作对策程文《策·第一问》就说：“今日之风尚，抑尤有可愕者。民服于奇淫，士竞于吊诡，丑宿儒之所共闻，而傲天下以不可知。言出于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常言也；有一人焉，谈外方异教奥僻不可训之书，则相与诵而法之。行出于仁义孝友，庸行也；有一人焉，破常调而驰格外，寂寞至于不可甘，泛驾至于不可羁络，则相与侈而传之。进稗官而退史籍。敢于侮圣人，而果于宗邪说。其初止于好新耳，以为不奇则不新，故争为幽眇之说以撼之；又以为不乖常戾经则不奇，故至于叛圣贤而不觉。世道人心至此，几于白日之昏霾，而阴机遍天下矣。”参照宏道的言行，我们发现，他所指斥的“有一人焉”，与“不拘格套”的宏道倒是颇为相像或吻合的。同一个宏道，怎么会如此自相矛盾？其实这不是自相矛盾，而只是宏道的两个不同侧面的显示：一个从事艺术创造的人，没有几分浪漫的不甘受规矩约束的情怀，他怎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？相反，一个从事政务或担任主考的人，热心于破规坏矩，又怎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职人员？一个人所处的领域不同，言行的方式自亦有所不同。艺术世界的三袁和社会生活中的三袁，不是同一副面孔，也不应该是同一副面孔。同样，艺术世界的雷思霈和社会生活中的雷思霈，也不是同一副面孔。生活是立体的，人也是立体的，我们不能把一个历史人物平面化。

钟惺《哭雷何思先生十首》之五的自注说：“先生曾问予：‘胆识二字孰先？’予对曰：‘胆到处亦能生识。’先生曰：‘恐当是识到处方能生胆。’予曰：‘初无先后，但到处自能相生耳。’先生思之良久，首肯。”雷思霈关注有关胆识的话题，所显示的正是公安派的特点。袁中道《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》论及李贽对宏道的巨大影响时曾说：“先生（袁宏道）既见龙湖（李贽），始知一向掇拾陈言，株守俗见，死于古人语下，一段精光不得披露；至是浩浩焉，如鸿毛之遇顺风，巨鱼之纵大壑；能为心师，不师于心；能转古人，不为古转；发为语言，——从胸襟流出，盖天盖地，如象截激流，雷开蟄户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……已复同伯修与中道游楚中诸胜，再至龙湖，晤李子。李子语人，谓伯也稳实，仲也英特，皆天下名士也。然至于入微一路，则谆淳望之先生，盖谓其识力胆力，皆迥绝于世，真英灵男子，可以担荷此一事耳。”李贽所谓“胆力”，乃指一种无所畏惧的担当精神；所谓“识力”，乃指一种深邃的历史文化意识。李贽以“识力胆力”许袁宏道，这几乎近于禅宗的亲授衣钵。盖“识力胆力”，乃是李贽所自许而从不轻易许人的考语。中道明乎此，故其《答须水部日华》曰：“总之，本朝数百年来出两异人，识力胆力迥超世外，龙湖、中郎非欤？然龙湖之后，不能复有龙湖，亦不可复有龙湖也；中郎之后，不能复有中郎，亦不可复有中郎也。”袁中道将李贽与袁宏道的“识力胆力”相提并论，此中意味，不难把握。而当雷思霈拿“胆识孰先”这一话题与钟惺交流时，就不仅包含了传授衣钵的意味，还有反思公安派核心理念的意味。雷思霈在晚明文坛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，由此可见一斑：他不仅是公安派的一员健将，还对竟陵派产生了重要影响。雷思霈的诗文，对于了解公安派和竟陵派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，对于了解晚明文坛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。

三

德富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，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，成就斐然，同时也是一位勤奋执着的学术工作者，著述颇丰。他孜孜矻矻地搜集整理乡邦文献，在雷思霈诗的辑注方面用力尤勤。他几乎收录了目前所能见到的雷思霈的全部诗作，总计388首；还在注释中尽力提供相关资料，包括雷思霈的各类文章和雷思霈的门生朋友写雷思霈的作品，包括雷思霈所写人物的生平史料，虽然还未达到竭泽而渔的程度，但确乎已是难能可贵。对雷思霈诗歌中写得较多的夷陵的名山名水名人名物名俗等，他也结合诗句的注释加以详细介绍，而德富先生自己感到特别欣慰的是辑录了晋代宜都郡守袁山松的《宜都山川记》。该记对我国的山水游记曾产生重要影响，可惜早已失传。德富先生这次辑注雷思霈诗，查阅了大量